



上海的故事

第一册

I 252/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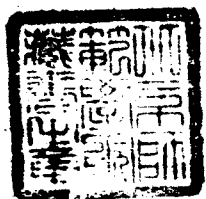
上海的故事

第一册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0715724



上海人民出版社

715724

上海的故事

第一册

本社编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上海绍兴路54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市印刷四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3.625 字数 76,000

1979年2月第1版 1979年2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200,000

书号 4074·404 定价 0.24 元

编 者 的 话

上海,解放前是帝国主义对中国进行政治、经济、文化侵略的重要据点,是国内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勾结帝国主义势力,奴役和压榨广大劳动人民的重要场所,也是我国民族资本主义最集中的城市。旧上海是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一个典型。旧上海劳动人民的遭遇,是旧中国劳动人民的遭遇的一个缩影。为了使新社会里长大的年轻人,懂得什么是剥削、懂得为什么要革命;使旧社会里过来的人,不忘过去,温故而知新,文化大革命前我们曾出版了《上海的故事》(共六册)。这套书所收集的文章虽只是对旧上海的一人、一事、一地的叙述和回忆,但它们是三大敌人对中国人民的残酷压迫和剥削的罪证,是对旧社会的阶级压迫和剥削制度的控诉。这些文章有助于我们认识过去那种“百年魔怪舞翩跹”的黑暗年代,激励我们去创造未来。

新中国成立以来,劳动人民当了国家的主人。在党的领导下,经过全国人民的努力,祖国面貌起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上海作为我国的重要工业和科学技术基地也发挥着它的应有作用。粉碎了“四人帮”,在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进入新的发展时期,为了适应新时期总任务的需要,我们把过去出的这套书整理成四册重新出版;在内容上也作了若干增删。我们今后还准备将这套书继续编下去,欢迎读者提出意见,帮助我们做好这一工作。

1978年10月

目 录

帝国主义攫取上海海关始末·····	高云昇 (1)
外滩——帝国主义银行的集中地·····	程 起 (19)
沙皇俄国垄断中国电信事业的工具——	
大北电报公司·····	高仰止 (26)
旗昌洋行的侵略活动·····	立 成 (34)
徐家汇圣母院育婴堂真相·····	李贵芳 (45)
徐汇公学——旧上海帝国主义文化侵略	
的一个据点·····	冰 谷 (60)
帝国主义在上海的一桩罪恶勾当——	
人口贩卖·····	李家寿 (69)
外白渡桥的故事·····	吴静山 (78)
华尔和洋枪队·····	佳 就 (86)
害人不浅的回力球场·····	林之三 (94)
美帝狡计夺“上电”·····	杨 宣 (106)

帝国主义攫取上海海关始末

高 云 昇

在大厦林立、绿茵如画的上海外滩，可以看到一座高高耸立在一幢大楼上的大钟。这座钟就是海关大钟，这幢大楼就是上海海关大楼。

这座海关大楼于一九二五年奠定基石，到一九二七年建造完成，造价共四百三十余万两银子。

在一九二五年以前，这里也是上海海关，不过名字叫做“江海北关”。江海北关在一八四六年时是一座中国衙门式的建筑，看起来很象一座大庙。一八九一年（清光绪十七年）改为西洋式，到一八九三年造成，形式很象一座教堂。它的四周有铁栏杆围着，一进门的南北两面都有石级，石级前面各蹲着一只石狮子。那时屋顶上也装了一座大钟，不过比现在的大钟要小一些。房子的大门上有一块横匾，写着“江海北关”四个大字。

海关是祖国大门的钥匙，它是征收关税和执行国家有关进出境法令的行政管理机关。但是，在解放以前的百余年中，这把钥匙却一直掌握在帝国主义的手里。帝国主义通过海关，对中国人民进行了敲骨吸髓的压榨和掠夺。海关大楼成了帝国主义策划吮吸中国人民血汗的重要活动场所。

早期的海关

上海在公元十一世纪就从荒滩变成了集镇，日本等国的船只已来此进行贸易。在十二世纪三十到七十年代的南宋时期，这里设有一个带有海关性质的机构，叫“提举市舶司”，办理对外贸易的征税工作。明末清初，实施海禁，上海的国际贸易不能开展。一六八五年（清康熙二十四年）正式开放海禁后，航海贸易很快有了发展，当时黄浦江中帆樯林立，十六铺已成闹市，十六铺到董家渡一带，商铺栉比，这说明上海已经形成一个港口了。清政府为了适应这个形势，就决定在上海县设立海关，专门稽征进出国境的船舶和货物的税款，并指派苏松太兵备道负责海关行政，称为“海关道”。这就是最早的上海海关。

此后，上海的对外贸易进一步活跃起来，关税收入也逐渐增加。一六九〇年缴给清政府的关税为二万三千余两银子，一七三五年为六万二千两，到一七六四年达到七万七千五百余两。当时实行的关税税则是一种划一关税，将货物分为布匹、食品、器皿及杂货等四类予以征课。清政府在税率上、关税行政上都有完全的自主权。

关税自主是国家的主权，它维护本国的经济利益，抵制损害本国经济发展的贸易，这是世界一切主权国家应有的权力。中国的这种关税自主权，对当时企图鲸吞中国市场、掠夺中国财富的英国侵略者说来，当然是一个很大的障碍。所以他们就处心积虑地企图侵夺中国的关税自主权，为他们扩大经济侵略铺平道路。一八三九年十一月，侵占中国市场的主

要组织“伦敦东印度与中国协会”致英国外交大臣巴麦尊的信中写道：“出入口关税，应由中、英政府协议厘订，以后非经双方同意，不得更改。”并说：“如需要用武力来争取这些条款，我们想英国人民，欧洲各国不会反对，……。”

从这封信看来，即使没有一八三九年林则徐的严禁鸦片，英帝国主义为了侵略中国，战争也是不能避免的了。在一八四〇年英国发动的鸦片战争中，它所要达到的目的之一，就是剥夺中国的关税自主权，这在战争结束以后完全实现了。

套上了枷锁

一八四二年，根据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五处被开为通商口岸。条约的第十款规定：英国商民“应纳进口、出口货税、餉费，均宜秉公议定则例，……。”这项规定，把中国关税税率的自主权就轻易地剥夺了。

事后根据这个条款，英国全权公使亨利·璞鼎查指派了罗伯聃来和清政府“议订”关税税率。双方各提出了一个税率表，但是，清政府的税率表并没有被英国代表所接受，谈判的结果是清政府完全接受了罗伯聃以“值百抽五”为基础所提出的税率，而且对货物在内地转运的税率也作了片面的规定。这个“协定税率”大大有利于英国侵略者的经济扩张，连璞鼎查自己也承认这“对于进口商，竟比商人们本身所敢于提出的，还要更加有利一些”。

英帝国主义在《南京条约》中不仅胁迫清政府接受“协定关税”，而且还伸出魔爪侵犯中国的海关行政权。条约的第二款中这样写道：“……且大英国君主派设领事、管事等官，住该

五处城邑，专理商贾事宜，与各该地方官公文往来”，并按照条约规定的条款，“清楚交纳货税、钞饷等费”。

这条规定，就给予上海的英国领事有干预上海海关之权。船舶在进口时，一切船舶证件、提单、舱口单并不直接交给上海海关查验，而是交英国领事馆收执，再由英国领事通知上海海关收税。英国船舶凭海关盖有“海关道”大印的文件向本国领事馆领回船舶证件，然后出口。这样，上海海关的行政权就不是完全独立的了。

《南京条约》签订后，美帝国主义马上派全权公使顾盛率领舰队来威胁清政府。清政府害怕了，就于一八四四年签订了《望厦条约》，把关税自主权同样拱手送给了美帝国主义。

帝国主义虽然在税率上和纳税手续上控制了海关，使中国丧失了关税自主权，但海关内部的一套行政机构和人员表面上还算控制在清政府手里。当时，上海海关的关址就在现在十六铺地段的外马路和环城马路之间。为了防止船舶走私，海关道官慕久就在洋泾浜北（现在的延安东路外滩以北）造平屋三间，设立盘验所一处，专门对进出口的外商船舶进行检查。

帝国主义的贪欲是永远不会满足的，他们觉得海关这个机构仍旧掌握在中国人手里，对掠夺、倾销、走私等很不方便；而且，他们感到随着贸易的发展，关税收入将逐渐增加，如果他们能完全控制这项巨大的财政收入，就更能控制清政府。所以他们就千方百计想把海关弄到手。

搬 进 租 界

一八四五年，英国驻上海第一任领事巴富尔向当时清政

府的海关道宫慕久说：现在已经开辟租界，外国商业区分布在外滩一带，外国商人到县城的海关来缴纳税款、办理手续需要走好几里路，很不方便，希望能把办理进出口税务的海关关署搬到英租界的中心区外滩来。巴富尔还对宫慕久说了一些威胁利诱的话。这样，清政府就于一八四六年在现在海关大楼这一地点设立了“江海北关”，专门办理外国船舶的征税事务。

这样，上海海关就变成了两个。在外马路与环城马路之间的仍称“江海大关”，主要办理国内沿海航线船舶的征税事务，基本上成了一个国内征税机构。这个海关在一八五三年小刀会起义时烧毁，一八五五年重建，到一八六〇年又在太平军与清军作战时毁掉，以后就没有再建，征税事宜改在大东门外老白渡救生公局办理。而“江海北关”，由于是专门办理对欧美、南洋、印度各地商人的征税事务，倒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海关。“江海北关”和“江海大关”相隔并不很远，如果步行，至多只要二十分钟。

那末，巴富尔为什么要坚持把关署搬到这里来呢？关于这个问题，他在一八四七年写的一篇《对中国等国家商务关系专门委员会报告书》中供认：“这是为了能够对海关实施监督，以遏止那些肯定有害于我们的一般利益的行为。”

“江海北关”那时完全是一座中国衙门式的建筑。有三大进房屋，每进都是五楼五底，第一进左右两边有很多廊屋，第三进两旁也有成排的屋宇。头门外还建有辕门，辕门前竖了两根旗杆。这在当时已是一座很宏伟的屋宇。因为它在原来关署以北，所以称“北关”，又因它在租界以内，有人就称它为“洋关”，也有人称它为“新关”，以与县城外的老关相别。新关建立以后，盘验所也就撤销了。

海关被劫夺了

一八五三年九月七日，上海的小刀会起义军占领了县城，攻下了道台衙门，道台吴健彰被捕。吴健彰原是洋行买办，帝国主义认为对他们有用处，因而由美国传教士晏玛太和美国公使马沙里派人向小刀会领袖刘丽川进行了各种欺骗性的交涉，终于把吴健彰弄进租界，让他住在美国副领事金能亨的家中。

在帝国主义营救吴健彰的同时，他们认为攫夺上海海关的机会到来了。英国以实行“租界中立”、“保障租界安全”、中国政府不能在租界内收税为名，用武力胁迫清政府的海关工作人员撤出。海关关署顿时空无一人。上海人民认为这是清政府的衙门，于九月八日加以捣毁，并从里面搬出了一些枪枝来支援小刀会。这时，英帝国主义又找到了借口，马上派出停泊在黄浦江中的“斯巴达人号”军舰的士兵来“保护”，把海关直接置于英国的武装看守之下。海关的工作人员既被迫撤出，而海关的房屋又为英国武装人员所看守，这样，整个海关也就被英国劫夺了。

在英国武装占领上海海关的次日，即九月九日，英国领事阿利国，一面声称现在上海的海关行政已经停顿，一面出了一个“船舶结关临时规则”的通告，借口帮助维持税收，由领事代表中国官吏收税。他的“理由”是当时港内船舶约有二十六艘，不能因小刀会起义而长期停止贸易。在他所拟的规则里还规定可以暂时不缴现款，而以签具期票作为担保，公然包揽海关事务。美国副领事金能亨不甘落后也在当天发出了内容相同

的通告。这样，英、美领事就变成了上海海关事务的“代行人”了。

可是，上海海关的关税是清政府江南大营军饷的主要来源，现在海关事务被外国领事一手包揽，关税收不到，清政府当然很着急。吴健彰秉承清政府的意志，就向英国领事交涉，要收回这座残破的关署，而英国领事坚持不答应。关署在英国海军士兵的看守下，吴健彰所派的官员连大门也走不进。另外，吴健彰的海关监督官印已经丢掉；没有官印，就意味着丧失了合法的权力。于是他就请江苏巡抚许乃钊和两江总督怡良奏准咸丰皇帝向常州督粮道商借官印应用。吴健彰虽然失去了关署这幢房子，但总算有了代表海关机构的官印，所以就在一八五三年十月十日发出“关税征收事宜仍按旧例办理”的通告，并即照会英国领事，要求征税。

阿利国收到吴健彰的照会后，当天即予拒绝。他发出复照说：“本领事认为须俟大清官军收复上海县城，阁下到江海关复职视事之日，本领事始准备与阁下进一步谈判征收关税事宜。”阿利国的条件有两个，一个是要清军仍旧统治上海县城，另一个是要吴健彰到江海北关办公。可是，县城在小刀会手里，江海北关在英国的刺刀之下。看来，关税是收不成了。吴健彰一方面努力争取收回关署，另一方面又欲向英国领事讨回英国商船的欠税。

十月十二日，吴健彰要求英国领事归还十艘英国船只在九月七日以前已结关的税款四万五千两。阿利国在次日就加以拒绝。吴健彰几经交涉没有结果，最后只好从阿利国所说的两个条件中去打主意，企图重新掌握关署。

水上海关的命运

到底如何能掌握关署呢？吴健彰想出了一个办法：另行寻找关址。可是，到哪里去找关址呢？县城，在小刀会手里；租界，帝国主义又不同意。想来想去，他想到了黄浦江。黄浦江既是清政府能够管辖的地方，不包括在租界范围以内，又有外国军舰的庇护，是一个最理想的地方。他设法弄到了两只船，成立了一个水上临时海关。这两只船原是向外国买来的，非常破旧，买来以后改装成为炮艇，并曾用来轰击县城中的小刀会起义军。外国领事发现这两只船停靠在外国船舶之间，就出来干涉说：这种船，特别是其中的一只“羚羊号”储藏着重军用品，很不安全；而且清政府的船舶很容易成为小刀会起义军攻击的目标。因此，他们就把它作为最危险的邻居而加以驱逐。吴健彰只得把这两只船移泊到浦东陆家嘴，并在船上悬挂了海关旗帜。十月二十六日吴健彰照会英、美、法等国外国领事，宣称把这两艘船作为临时海关关址，并预定十月二十八日开始办公，正式征收关税。

对这个水上海关，帝国主义的态度怎样呢？在宣告对外办公的次日，即十月二十九日，一艘装满出口货的奥国船“罗伯特号”根本不理睬这个水上临时海关，堂而皇之驶出港口去了。商人为什么这样大胆？只要看一看领事的态度就知道了。法国代理领事爱棠就在这一天写给吴健彰的复信中说：“……自从海关被中国人自己毁掉之后，任何有关收税权利已归消灭，本领事认为对中国国库不再负有任何纳税的义务”；“本人认为有权准许我国船只自由地进出本港而无需缴纳任何关

税”。法国领事是这样，其他各国领事唱的基本上是同一个调子。英、葡、荷、普等国领事在答复奥古斯汀洋行、蒲尔洋行、金史密洋行、魏德卯洋行的信件中都这样说：“……并未接到中国当局关于恢复上海海关的通知，也不知道有这种机构存在”。

他们对停泊在离开领事馆没有多远、悬有海关旗帜的两艘船，只当没有看见一样。十一月二日，英国领事写给吴健彰的一个复照说，英国承认不承认这个水上海关，要等到请示英国驻华全权公使后决定。到十一月二十八日又复照说：“全权公使认为你方实没有权利要求征收任何关税。”

美国商人对这个“随时可能被赶跑的”水上海关，当然置之不理。但是美国领事在处理这一问题时所使用的的手法却显得更阴险。他们兜了一个圈子，先由副领事金能亨在十月二十八日发出承认水上海关的通知，但在十一月一日给奥古斯汀等四家洋行的信中说：“……美国与中国所订的条约，其中切实载明，中国不得准许其他国家享有任何特殊利益。”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其他国家船舶不付税，美国商人当然也可以不付税，承认不承认这个水上海关是根本没有关系的。果然，在一八五四年一月二十日，他又发了一个通告，干脆就声明：“目前中国当局既准许其他国家的船只进入本港，不向中国海关报关，也不付税，则美国船只离港向本领事馆呈缴单据时，毋需附呈中国海关的结关单。”

这样，这个水上海关也就没有收到一文钱，上海成为一个免税的“自由港”，帝国主义的船舶可以任意进出，毋需办理任何手续，黄浦江无形之中成了帝国主义的内河了。这些领事原来公布的一些临时规则以及缴纳期票的办法，当然也就用

不上了。

回到陆上来

关税收入是清政府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水上海关既然维持不了，吴健彰又决定在租界以外的陆地上设立一个海关。他于一八五四年二月在苏州河北岸设立了一个海关办事处，并且通知英、美、法三国领事说，这个海关将在一八五四年二月九日开始办公。这是海关的第三次搬家了。

海关设在陆地上，不是随时可以“被赶跑的”，帝国主义不承认似乎找不到理由。英、美、法三国领事在二月六日的复照中只得在表面上加以承认。但在承认的同时，附加了一个条件，这个条件是：海关的监督权不论对于缔约国或非缔约国的任何船只，均应一律生效。

这就是说，吴健彰要首先向其他各国收到关税，他们才承认这个海关的权力。帝国主义在上海的喉舌《北华捷报》的评论却说得更为露骨：“要付税就得大家付，如果不付的话，大家也不必付。”报纸恐怕还不够明确，就进一步说明它的立场：“实无充分理由由清政府来征收关税”。

紧随着言论的就是行动。英国的船只第一个自由出入港口，其他各国跟着也不结关、不缴税，横竖有话在先，要不付就大家不付。这个海关，虽然设立在租界之外，虽然得到英、美、法三国领事书面上有条件的“承认”，可是，很少有船到那里去办理结关手续。大部分船舶干脆停泊在吴淞。这些外国商人那里有防护周到、武装齐全的鸦片趸船保护，而且在那里大搞走私。吴淞是不在条约订明开港贸易的区域之内的，但是

清政府又有什么办法呢？

三月十七日，总算有一只船到这个海关来办理手续了。这只船是普鲁士不来梅港的“亚里斯泰茨号”，它装了一批茶叶准备运到美国去。船主和海关讨价还价，结果，海关在外商压力下，同意只申报一半税款。而在这半数税款中，除了缴一小部分现款外，对其余六千二百五十两税款，也只开了一张有附加条件的期票。这张期票的兑现条件是：当时在港口内所有各船只即使不完纳全数关税，至少也必须每担茶叶完税二两，每担丝完税九两。这个条件是清政府根本无法办到的。

两个小“海关”

帝国主义这种无休止的挑衅，使得吴健彰几乎收不到什么关税。于是，他把脑筋动到出口货物的关税方面。当时从上海出口的货物都从苏州、杭州等方向运来。他打算把征收出口税的事务移到通往内地的路上去办理。这样，即使苏州河边的海关收不到进口税，至少在内河的关卡上可以收到出口税，关税的一半也就有了着落。他经过巡抚许乃钊的批准，就在苏州河上的白鹤渚，黄浦江上游的闵行镇设立了两个征税关卡。在吴健彰看来，关卡设在上海内地，不受租界的管辖，而且又是向中国商人收税，自然不受帝国主义牵制。但是，他又不得不向外国领事打个招呼，因而就在三月二十五日照会英国领事说：自成立两关卡之日起，一切由内地运往上海的货物均由中国商人向关卡纳税。他并且声明在关卡成立以前已运到上海的货物，其税款仍应向外国侨商征收。这个办法，在吴健彰看来，由于在白鹤渚可以查验北面来往的货物，在闵

行可以查验南面来往的货物，对征收出口关税是有把握的。

帝国主义怎会就此罢休呢？美国公使麦莲首先出场，他抗议说：“不在公认的通商口岸而在内地各处征收协定关税，是一件违反条约的行为。”随后英、美、法三国领事联合通知吴健彰：“无法承认中国当局违背条约、条款的行为。”并且在五月九日向外国商人发出一个联合通告说，大家不必缴税，这个责任完全与领事无关。换句话说，责任不在外国，而在清政府。这种话，自然只有帝国主义才说得出口。

一宗大买卖

帝国主义这一连串的做法，使清政府无所适从。问题的关键当然不在海关的关址究竟设在什么地方才能算数，问题在于帝国主义存心就不想使中国再有自己的独立的海关机构。现在，吴健彰无法可想，这些领事们看到攫夺海关的时机已经成熟，才口吐真情。英、美、法三国领事在抵制内地关卡的同时指出：如果关税的征收，能以任何方式置于三个有约国（即英、美、法）的有效管辖之下，就象置于海关行政当局的管辖下一样，就会是适当的。帝国主义横逼竖逼，要把海关逼到手。

帝国主义知道，要做成这桩交易当然并不很简单，所以他们又进一步使用了卑鄙手腕。四月四日，英美两国军队从租界向西移动，在现在的西藏路威胁驻在泥城浜以西的清军，引起了所谓“泥城之战”。第二天，吴健彰马上出来赔罪，利用这个机会，一场出卖主权的交易就开始了。

帝国主义所要的主要有两件：一件是扩大租界特权；另一